

· 历史文物 ·

南丝绸路上的川滇锁钥——会理

会理县政协 肖志鹏

会理，古称会川，历史上因系“诸酋听会之所”而得名，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紧邻新兴钢城攀枝花，与云南省隔金沙江相望，自古为南丝绸之路上的川滇锁钥，现据史分叙于后：

(一)

在《西南古道与王朝开边》一文中，范建华先生认为“王朝开边，以开道为始，王朝略边，依道通否定；王朝治边，沿道设据点”。从此论中，我们找到了会理建县的源由。

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12年）张骞从西域归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东南身毒国”（《史记·西南夷列传》）。张骞向汉武帝说明了在蜀地川西平原和身毒国（印度）之间，有一条早已开通秘密商道，这是汉王朝通往大夏的“宜径”。

西汉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司马相如”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史记·太史公自序》）。同年，汉武帝置越嶲郡，领邛都、灵关道、台登、定笮、会无、笮秦、三绛、苏示、阑、卑水、大笮、青蛉、姑复、潜街、遂久等15县。其中，会无即现今会理县，三绛即现今

会理黎溪区以南。足见，会理建县是西汉王朝开通南丝绸之路（以下简称南路），略边（征服西南夷）战略的结果。

在中国历史上，对外孔道有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及南路等三条。南路较之北路、海路，约早开通两个世纪。

南路，由三道组成。三道名称，虽在各朝不同，但较为通称的是：灵关道，从蜀（成都）——邛（邛崃）——若栋（名山）——长岭（雅安西南）——邛崃山杨母阁——九折坡（均在汉源）——灵关（深沟）——台登（喜德、泸沽）沿孙水（安宁河）到邛都（西昌）——会无（会理）——三绛（会理黎溪南）渡泸水（金沙江）——青蛉（永仁、大姚）——阳苴咩城（大理）；五尺道，由成都——宜宾——盐津、朱提（昭通）——阳苴咩城（大理）。至此，灵关道、五尺道二道合一；永昌道，由阳苴咩城——永昌（保山）经滇越（腾冲）缅甸入印度。

攀西地区，地处金沙江、雅砻江、龙川江、安宁河等三江一河交汇地。特殊自然地理条件，倍受历代人类交通之青睐。无论古之南路，国民党政府修的“西祥路”，还是六十年代所修“成昆铁路”，均未舍此途而求其它，杨森《南丝绸之路的开凿与形成》。

（二）

自汉武帝征西南夷，郡县制度在西南夷地区确立之后，王朝对西南夷的径略，更是步步加深。自秦以来，历朝均把开道、治道、通道作为开边、略边、治边的重要途径。为此，在官道上，汉设“邮、亭、驿、置”，元设站赤，明设驿亭，清设关哨，把不连贯的民间道路，变成一条由官方维修、管

理的驿道。以唐为例，据《蛮书》所载，唐宋南路共五十一驿，2934里。其中，在会理境内的，计俄准岭（现德昌安宁河谷诸山），俄准岭馆（甸沙关附近）、箐口驿（石窝）、茂驿（白果）、会川镇、目集驿（唐和集县今凤营乡）、河子镇（黎溪大湾子）泸津关（拉蚌渡）等8驿，235里。再以元朝为例，《元史》53卷载：“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至，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又“星罗棋布，脉络相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综上，历代王朝一切径略活动，都是围绕着交通线的“开”与“通”展开的，开道与开边，治道与略边，成了王朝开边史和西南边疆与中原内地关系史的主题。

（三）

南路跨越横断山脉，两千多年来，马蹄在陡峭崎岖的路上敲下了深深的凹窝，它将祖国的大西南显示在世界的面前，又让世界从这里走向中国的大西南。南路在中华民族史、国际贸易史上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南路是远古民族的走廊。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将其臣民远迁蜀地，冶铁商卓氏夫妻二人，来到临邛。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在市中开店酿酒，至今传为佳话。

南路是历代政治之路。据《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所载，从开元开始，“诏自（之和）12年至是，比岁遣使来期，或年二、三至者”。据史书所记，自前蜀乾德二年（公元920年）至熙宁9年（公元1076年）的156年中，川滇段入贡取行达40次。到了明代达官贵人谪守戍边，多取此道入云南。明嘉庆三年（公元1524年）

正德庚辰科状元，翰林院修撰杨升庵，因扰疏谏武宗微行获咎，引疾归家。其父力谏不果去职，杨和王元正等，继续向皇上面陈时弊，指下桂萼，张王总等滥定典章，专事逢迎，曾在顺门泣谏，声彻殿庭，两次遭庭杖，谪贬云南永昌，途经会理，滞留数月，曾在元泉观题诗，皈依寺吟联，五里坡咏梅，松坪关话别，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

南路，是历代用兵之道。以隋唐为例，据兰勇先生《南方丝绸之路》所载，自隋开皇17年（公元597年）至唐朝乾符元年（公元874年）的277年中，南路川滇段，共发生大型征战达16次，主要是南诏攻大唐，据《南诏野史》所载，南诏进犯建昌。乾符四年（公元877年），景庄帝因怒疽，薨于越嶲郡景净寺。《汉志·三绛县》载：汉诸葛武侯“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三绛）渡泸得青蛉县（云南永仁、大姚）”。《西南丝绸之路考察札记》著者邓廷良、《华阳国志》注家刘琳等先生亦认为：鱼舛两岸石棺葬累累相峙，属同一文化类型，黎溪发现过青铜式编钟，黎溪以南15里的河口发现过汉墓，会理城关发现过汉砖。况正史记载，汉王朝曾派王褒由蜀经越嶲至青蛉县祭过金马碧鸡神。因此，“五月渡泸”，舍鱼舛渡口别无佳处。

南路是一条隐显于云雾林中，缠绕万水千山，连结异国他邦的贸易通道。兰勇先生在《南方丝绸之路》一书中认为，汉晋，南路在政治军事上的意义大大超过经济贸易的意义。盛唐，南路的贸易地位有所提高，但与北路、海路仍有很大差距。明清以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这为南路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从贸易品来看，兰勇先生认为，唐宋，南路贸易以进贡、回赐和官办茶马贸易为主。贡品主要是战马、珍

禽异兽、奢侈品；赐品主要是锦帛、锦袍、裘衣、器币。明清，滇缅印大路畅通，小道多有开凿，塘铺增多，用兵弁押运转输川盐、云烟、南土、普茶、下关茶、黄丝、棉布、棉纱。《武定直隶州志·艺文杂志》卷6载，“龙街渡川滇要津，清代由于摆渡人任意加收渡钱，清政府在渡口勒石告示：每人（包括捎或担子）收钱30文，每驴收钱50文，每骡马收钱60文”其商旅之盛可见一斑。另据《礼补·滇游续纪》卷中载，与会理一江之隔之龙街，许多盐商留下，“盐商爱上白夷楼”诗句。又《明史·四川土司志》载，“浙江红福龙游三、五万商人在云南卫府城乡生放钱债，利上生利，收债谷来贱买贵卖，娶妻生子，置奴仆二、三十年不回原籍”。这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丝绸路上，当时川滇交汇处边贸之盛。据《会理州志》、《会理乡土志》所载，“明代以来，会理以特殊地理位置成为四川通往滇黔的重要枢纽，各省商旅云集，商业繁盛。明洪武30年（公元1397年），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商家在会理首建北五省会馆，续而云南商帮又扩建滇南会馆。至清代，仅在县城就发展到包括滇黔、川赣、鄂、闽、粤、江、浙、蓉等十大会馆”。《会理县商业志》载，“民国时期，会理有72种行业。民谚‘会理有72场，场场72行’”之说。又“会理物产富饶，大宗农副土特产品有蜡虫、白蜡、黄蜡、土靛、鸦片、食糖、畜禽、牛羊皮……等”50多种。清道光21年，按输入出双边计算，会理鸦片年交易量达400余万两，年产虫籽3万多公斤，值6万余银元。县城有信诚、意诚、诚昌、樊华、汇昌、聚丰等商号13家，工商户2960户，从业人员7239人，资本总额达210多万元（法币）。

(四)

从会理建置之始，迄今已达2104年了。沧海桑田，解放40多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南路上川滇锁钥的会理，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1989年与解放前夕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8.59倍，县财政收入增长了51.60倍，粮食总产量增长了1.91倍，猪牛羊存栏增长了5.63倍，县属工业产值增长了94.68倍。农、林业经济，开始由单一粮食生产向农、林、牧、副、渔、工、商、运、建、服、全面发展转化。1989年，全县工业企业达165个。主要工业产品年产量：铁矿石60多万吨，原煤50多万吨，黄金4.47公斤，铜精砂2299吨，锌精砂6706吨，锡精砂212吨。解放前，会理仅有一条川云西线，通车里程仅153公里。截止1985年，全县修建公路111条，通车里程达1425公里。农村人平纯收入，由1965年的56元增加到645元。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889年与1950年相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了68.7倍，居民储蓄额增长了28.95倍，各类学校增长2.97倍，在校学生增长6.16倍，教职工增长9.38倍。

邓小平南巡重要谈话发表后，县委、县政府决心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导向，重新开拓南路川滇锁钥会理，提出“加强一个基础（粮食）狠抓6个支柱（烤烟、蚕桑、石榴、畜牧业、乡镇企业、第三产业），搞好5个建设（水利、能源、交通、通讯、科技），开发10个系列（烤烟、蚕桑、水果、畜产品、食品加工、轻化工业、有色金属、

黑色金属、非金属和林产品系列)，力争到1997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10亿元、乡镇企业总值达8亿元，财政收入达8000万元，粮食总产量达3.5亿斤，牧业总产值达1.5亿元，烟叶总产量达40万担，蚕桑移栽1.5亿株，石榴植株达500万株，副业收入1.5亿元，农民人均收入达1500元。

开发大西南，既是中央蓝图，也是各族人民开拓致富的共同愿望，更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如何用现代化的手段重新开拓南路的重任，历史的落在我们的肩上。我衷心地祝愿南路在祖国现代建设事业中重放异彩，再立新功。

一九九三年五月廿日

“五月渡泸”之渡口考

肖志鹏 霁虹

诸葛亮征南，“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在我国古代战争史上，可说是重大的军事行动了。那么，“五月渡泸”是选择哪个渡口的呢？这个问题，史家中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走的龙街渡，一种认为是走的鱼蚌渡。

古代四川通往云南的道路有夔道和清溪道。《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始楚威王时（公元前339年），使将军庄跷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跷至滇池，（池）方三百里，旁平地，沃千里，以兵威定。”又载：“秦时（公元前221——207年）常頰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

焉。”此道史称“夔道”，即由岷江而下，经夔道(宜宾)，过金沙江，入朱提(昭通)，过汉阳(赫章)、味县(曲靖)、滇(昆明)、楚雄、大理、入永昌等。《水经·江水注》说：“汉武帝时唐蒙“凿开阁，以通南中”。后经隋、唐修整，称“石门道”。另一条道为“清溪道”，即由成都经临邛(邛崃)、灵官(芦山)、严道(雅安)、笮都(汉源)、邛都(西昌)、会无(会理)渡金沙江达蜻蛉(大姚)，经叶榆(大理)，汇入永昌道。汉唐时，此道为中原王朝节制南诏的重要通道。汉晋时，清溪道金沙江渡口为鱼鲜渡。到唐代，龙街道因适宜于渡船而发展起来，商旅行客多从龙街渡过，龙街渡随之也就成了“官道”渡口。

诸葛亮渡泸得蜻蛉，可证实他走的是清溪道。然而，渡泸的渡口，到底是龙街渡还鱼鲜渡呢？前面已经提到，汉晋以前清溪道以鱼鲜渡为主，唐以后才逐渐移往龙街渡。这就说明，从龙街渡过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再来看鱼鲜，彝语“笮”、“鲜”等声指索或溜索，也有以索为桥之意。纳西族及其它彝语支民族称桥之语音均与“笮”切近。《元和志》卷三二载：“夷人于大江水上置藤桥，谓之“笮”。现“鲜”，均从“笮”之音转化而来。金沙江两岸称“鲜”的地方较多，但凡称鲜的地方，均是可以过渡的渡口。从大姚、永仁至会理金沙江沿岸一带，除大的渡口外，民间小渡尚有“三十六渡”。

“鲜”为渡口，我们可以认为“鱼鲜”是一个古渡口，那它是不是清溪道的渡口呢？《汉志·三绛县》中说：“三绛渡泸得蜻蛉”《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三绛县，一日小会无，音三播，道通永州，渡泸得蜻蛉县”。《华阳国志》

注家刘琳认为汉三绛县在黎溪左近。近年，会理县文物工作者在黎溪发掘出青铜式编钟和铜鼓，发现过汉墓，黎溪大海子附近小海子的村民，在泥泽中发现古时民用物件，有传说认为那里过去是一座城池，在一次大震中沉没。从各类出土文物和史实可以断定，“三绛县”在今黎溪大海子附近无疑。确定了“三绛县”，我们可以知道，由黎溪大海子经茨坪去鱼舛，不足10公里。清溪道经三绛，鱼舛渡江成为必取之道。

我们来看鱼舛古渡。古渡口不在现西祥公路的渡口，而是在现渡口上游约两公里处，该处江道狭窄、拐弯，两岸山峰高耸，对峙突出，是一个理想的渡口。

记得小时在家常听老人讲一个故事：一个仙人想把山上的石头赶往鱼舛渡架桥，方便两岸人民往来。他利用法术，把石头当猪来赶，赶到江岸半山时，遇到一个人，问他：“你把这么多石头赶到什么地方啊？”这人的话刚说出，石头就不走了。因为仙人把石头当猪来赶，就不能说石头，只能说猪。仙人的法术被这人破掉了，石头全停在山上。过鱼舛渡，从拉舛村上山，翻山即可见一深谷，谷中有无数黑色石头，形状如猪。《华阳国志·蜀志》载：“三绛县一曰小会无，音三播。道通州外，渡泸得蜻蛉。有长谷，石（猪）坪中有石猪，子母数千头。长老传言：夷昔牧猪于此，一朝化为石，迄今夷不敢牧于此。”《水经注·若水》也载：“蜻蛉县北临江边，有石猪，子母数千头。老老传言，夷昔牧于此，水下有石猪峰。”这些记载与笔者小时在住家鱼舛附近听到的民间传说相一致。史称“蜻蛉县北邻江边”。无可厚非，可以断定是指的鱼舛渡，而石猪坪，也只有鱼舛对面才有。

既然汉晋时“鱼舂渡”为清溪道渡口，且渡泸得蜻蛉县。完全可以断定，诸葛亮走的就是鱼舂渡。诸葛征南是大国伐小国，且有许多堂而皇之的理由，他完全没有必要偷偷摸摸地走那些小渡口。特别是古时西南山高林密，一片障岚，他带几十上百万大军，只有走大道才行得通。古时修道选择鱼舂渡作为渡口，解放前修西祥公路也选择鱼舂作为渡口，从地理环境来讲，不能不说有它特定的原因。

在今鱼舂对面拉舂背后的格地村，村后有十几米高的大石，形状古怪，上面刻有四字：“可以栖迟”，至今尤有残痕。当地村民说：这是诸葛亮征南时用手指刻出的。拉舂村背后有一石坊，坊下有一碑，上面刻有文字，修成昆铁路时，坊与碑均被埋于地下，上面写的字无从查找。随史上却有一段记载，隋朝名将史万岁征南，到金沙江边见一碑，上有诸葛亮题字：“万岁过此，胜我者多矣。”想来碑跟此有牵联。

诸葛亮渡泸征南，走鱼舂渡无疑。

诸葛亮是尚于御谋，长于用兵之人，在进军征南时，决不会犯孤军深入之忌。当他出成都，顺岷江而下，经宜宾，从昭觉出西昌后，便兵分两路，分头前进。一路由他亲自带领由西昌沿安宁河谷经会理到三缘渡泸取蜻蛉；一路由一位将军率领从西昌翻拖木沟，由拖木河直下经宁南、巧家，过昭通，直取昆明，两路大军对昆明形成包围之势。虽无古籍记载，但清溪道有孔明驻军的痕迹，拖木沟河谷也有他驻军的痕迹。且古代进兵，喜两路进军，对目标形成包围，所以，诸葛亮征南，分一路走巧家也极有可能存在，当然，这还须史家作进一步的研究。

古道觅踪

——西南“丝绸之路”穿越会理路线初探

杨炎宗

我国西北有一条古代的“丝绸之路”，影片大型舞剧《丝路花雨》曾给我们作过美丽动人的描述。但还有一条形成更早的“丝绸之路”却并不那么有名，这就是从成都经云南通往缅甸、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

古西南“丝绸之路”就是汉武帝尽力寻求的“蜀身毒路”。它由古“灵关道”和“博南道”衔接而成。“灵关道”由成都——邛崃——雅安——越嶲——西昌——姚安抵达楚雄，因越嶲古称“灵关”而得名；“博南道”由南华——祥云——大理——永平——保山抵达德宏，出境通往缅甸转道印度，以永平古称“博南”而得名。这条古代的重要交通线比著名的西北“丝绸之路”还要早两个世纪，其走向和今天的川滇公路、滇缅公路大体是一致的，有的路段甚至是古今道路的完全重合。这条古道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沟通和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往来；近代在抗日战争末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对开发和保卫祖国西南边疆，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最早的信息

对这条古道作出合理推断并最先正式提供信息的是西汉武帝时的张骞。《史记·大宛列传》中张骞说：“臣在大夏（今阿富汗）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

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印度古名，身音员）。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以蹇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张骞在大夏见到蜀物，从方位上推论“其去蜀不远”是相当准确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又说：“汉兴……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大夏国人能在身毒买到邛竹杖、蜀布的事实说明，四川的少数商人贪图厚利，不避艰险，“窃出”邛都、滇池地区，通过土著民族的帮助（主要是向导）到印度做生意，已是完全肯定的。

张骞提供的这一信息，引起了汉武帝刘彻极大的兴趣。他派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间使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当羌乃留为求道。四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显而易见，使臣们虽然到了滇池地区，但土著部落的首领们对汉使的进入和探求道路的意图，一定存有戒心，不愿提供向导和情况，甚至还可能故意制造假情况以迷惑汉使，以致“数岁，道不通”而还。虽然没有找到通往身毒的途径，但初步开通了蜀滇之间这段道路，实质上等于完成了对“灵关道”的进一步查勘。

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和巴蜀商人是这条古道的最早开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利”和逃避汉王朝的控制，他们长时期保持着古道的秘密，使这古西南“丝绸之路”成了我国古代交通史上的一个谜。

会理南向古道的变迁

古西南“丝绸之路”经过会理是早经史学家们肯定了的，但具体途径却没有明确的记载。北南走向仅知道上接西昌，

下达姚安，但没有这中间的具体历程。要弄清这一问题，无疑地只能从汉代以后有关史籍、地方志所载道路线索结合其发展变化来探求了。

会理北南通道上北界最远和最古的地方是南诏时期的阳蓬岭，以后常见于史料的则是甸沙关；南界是现属云南元谋的姜驿。这北南两处当是古代进出会理地区的南北口。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唐南诏时甸沙关名“箐口驿”，宋属大理时名“过沙甸”；据《云南志》注释，阳蓬岭即落腰山（即今德昌乐跃），是南诏与嵩州的分界，却未见有姜驿的记载。《中国历史地图集》有“末栅馆”之名标于现在的鱼鲊位置，从史料对照，“末栅馆”不应是鱼鲊，而应是姜驿。《云南志》载：“目集驿至河子镇七十里。”“河子镇至末栅馆五十里”。目集驿即今凤山营，河子镇即今河口，里程也相符的。河口与鱼鲊在地理位置上是相背的，道路的走向决不会南到河口后又回过头来北上转西到鱼鲊。从字义上看，“末栅”可解释为“最后的门户”，而姜驿则在会理最南端金沙江北岸山上。之所以往往把鱼鲊作为古代入滇的出口，正是由于对会理入滇道路缺乏全面的了解所致。

以北南出入口为基点，古西南“丝绸之路”和会理境内直穿南北的道路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有部份地方因修筑川滇公路（会理境内的原名西祥公路）需绕道而有一些变化，在这些地方尚能找到古道的遗迹，经过的村寨，有的还保存着古老的名字。按道路走向把它排列出来，对探索这条古道的发展变化，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其北南走向的次序是：（均按旧名）

甸沙关—摩挲营—巴松—分水岭—孔明寨—前马湾—白

果湾—夷门—柳树塘—油菜地—大湾营—铁索桥—瓦店子—沙坝—五里牌—三元桥—老街子—会理县城—水路—糍耙店—长山梁子—大卷洞—头堂—小柳树—鹿厂—箐山营—沙河铺—洪川桥—凤山营—马鞍山—大桥—七墩堡—小关河—铺边—黄土坡—羊合伍—老棚湾—中厂—河口—芦湾梁子—松坪关—绿水河—界牌—姜驿。

在这条通道上的四十四个地名中，一些可见于早期史籍。如甸沙关、巴松（唐名芭驿）、箐山营（唐名箐山口）、沙河铺（唐名沙卧河）、洪川桥（原为铁索桥，唐名密迹桥）、凤山营（唐名目集驿、明名腰驿）、马鞍山（明名五里坡）、河口（唐名河子镇）、松坪关（关前为塔甲渡）、姜驿（唐时应为末棚馆，元代名姜站）。元、明以来在这条线上设置驿站，又曾有过一些变化。德昌以下是循安宁河直下到明夷站（即今米易），向左转湾越大龙站到会理，其所设站自北而南是：法山站（德昌境）—明夷站—大龙站（即今会理清水河关顶）—会川站—黎溪站—姜站。这一变化可能和开始开发安宁河流域有关。到明代仍循这一路线改站设驿，只在会川驿和黎溪驿之间增设了一个中间站—腰驿。大概因其地处山顶，气候偏寒，常年皆不离火塘，故俗称“火烧腰驿”。清代驿站裁汰，改设铺递，从会理县城向南依次有：普庵庙铺，箐山营铺，沙河铺，密迹关铺，凤山营铺，五里坡铺，七墩堡铺，小关河铺，黎溪站铺，芦湾铺，松坪关铺，绿水河铺，界牌岭铺。唐、宋、元、明直到清代，这条古道的走向除北段曾小有变化外，南段是完全一致的。从而可以认为，这一路线就是在古西南“丝绸之路”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而形成的。

入滇渡口之谜

古西南“丝绸之路”出会理境渡过金沙江即进入云南，这一过江的渡口就是古道穿过会理境后的南向出口。但这个渡口在哪里，却象“武侯南征渡泸处”一样，成了众说纷纭的谜。解开入滇渡口之谜，是探求古道途径的重要一环。

众多研究诸葛亮南征的著述，都认定南征大军是从鱼鲊渡口“渡泸入青蛉”的（“青蛉说”）。如从该说，则南征入滇路线从越嶲郡南经会无入青蛉一段，正是古西南“丝绸之路”灵关道的南段。但认定鱼鲊是入青蛉的渡口，还缺乏足够的论据和说服力。

从现能查到的古文献资料和地方志中，在清朝中叶以前都未见鱼鲊这一地名，历代从会理入滇的道路都是有如上述走向的。《新唐书·地理志》说：“阳蓬岭北嶲州境，其南南诏境，又经箐口、会川四百三十里到河子镇城，又三十里至泸水。”《云南志》（蛮书）也说：“会川有蛮充刺史，称会川都督。从日集驿至河子镇七十里，三十里至泸江，乘皮船渡泸水。”两者都说是经河子镇（即今黎溪之河口）南渡江的。明代的状元杨升庵因议大礼获罪谪贬永昌卫（云南保山），也是走的这条路，留下了会川五里坡咏梅的长诗《南枝曲》和七绝《松坪关》。清乾隆六十年纂修的《会理州志》所列津梁渡口，都还没有鱼鲊渡之名，直到同治九年重修的《会理州志》始载其名。元、明、清以来也没有在鱼鲊方向设过任何驿站和铺递。《中国历史地图集》曾在鱼鲊位置标过“末栅馆”，前已说明其误，还曾将会理“州南三十里”之“泸津关”在唐代标在鱼鲊，元代又标在县东城

河边，这恐怕都是一种推测和估计，很大程度是“鱼鮓”这一渡口出现后才形成的，特别是四十年代西祥公路经鱼鮓渡江形成的影响和误解更大，实际上，鱼鮓这一渡口应是清朝中叶（约在嘉庆一咸丰间）才被开发出来的。在乾隆本《会理州志·村屯》中，沿江及鱼鮓附近的阿鸡鲁村、鮓石村、河漂村等都有记载，有的还注明“过江入云南界”，就是没有鱼鮓。据此可以认为，鱼鮓既非古西南“丝绸之路”的渡江入滇处，也不是诸葛亮南征渡泸处，真正的古道入滇渡口，应从姜驿附近去寻求。

一条被遗忘的古道

从姜驿直下火焰山，是现今通往云南元谋的龙街渡口，这个渡口是元、明时期才开辟的，其路线是经元谋、武定通向昆明。而古西南“丝绸之路”则是循古青蛉（大姚）、弄栋（姚安）一线，与此相距甚远。显然，古道入滇决不是在龙街过渡的。五十年代末期，笔者在那一带生活过，曾发现一条颇具规模的古道及通往江边的渡口，因废弃多年，至今已鲜为人知了。

这条古道是从姜驿转向西南，经阿腊益山到会理金雨乡的罗莫底村（也可从界牌直达罗莫底），直下金沙江边的安喇渡口，这可能才是古“丝绸之路”的旧道。

罗莫底村是四川省最南端的支撑点（据《凉山日报》资料），地处江边的半山，是上下途中的一个中间站；安喇渡之名见于同治本《会理州志》，俗称“船房”。这条古道不见于任何史料记载，但口碑资料和实地情况却证实它是会理历代往大姚驮运食盐的古道。《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

“青蛉有盐池”。会理过去和现在都习惯吃云南盐，历史上长期依靠大姚供给，这已和古籍记载吻合。由于盐是人们日常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在古代也需要交换或购进，开辟一条专门运盐的路线是完全必要和肯定的。这古道颇具规模，罗莫底村以上虽是土路，宽阔处已超过两米，以下则全是青石板筑砌的梯道，石板上蹄痕累累，有的深达数寸；在江对面的摸鱼鲊亦是如此，直达山顶的梯道更为宽阔。这些马帮常年行走留下的历史印记告诉我们，它是很古老的。

这条古道直通大姚（也可经永仁再转大姚），大姚在西汉建置为青蛉，与古称会无的会理相邻并同隶于越嶲郡。当时的永仁名苴却，是青蛉北部重镇。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罗莫底一带的老年人还习惯称永仁为苴却街，当地人去永仁赶场，早出晚归，当天可以打个来回。两县相邻，又需运青蛉盐池的食盐，除这条路外，再找不到更为捷便的通道了。

对于渡口的认定，可以史料作一些比较。诸葛亮南征到越嶲后，循灵关道南段入滇是完全可能的（这一点不同于“堂螂说”）。而且可以推论出古西南“丝绸之路”的入滇渡口，即是后来诸葛亮南征渡泸的渡口。

《滇系》载：“金沙江由会理州之西南合泸水，即武侯渡泸处。两崖峻极。俯视江流，如在井底。”这样的描述，非常符合安喇一摸鱼鲊渡口的实际。而上游不远的鱼鲊等渡口都较平旷、宽阔，与上面描述毫无相似之处。清道光二十五年纂修的《大姚县志·道路》说：“入滇之路，三蜀最古，则大姚其要津矣”。其《地理沿革》之“附论”说：“其所为青蛉县者治于何所，无可考矣。即唐设兴来县，亦不知其治所。相传苴却之大成里有地名兴来者，即县之旧治。”